

書評

南韓大戰略：自己的命運自己創造

South Korea's Grand Strategy: Making Its Own Destiny

張友睿 *Yu-Jui Chang*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碩士生

Graduate Student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一、理論分析

大戰略 (Grand Strategy) 一詞，最早出現於 20 世紀 30 年代，由英國軍事歷史學家巴塞爾·亨利·李德哈特 (Basil Henry Liddell Hart) 提出，旨在協調整合國家整體資源用以實現政治目標，隨之而來的二戰及冷戰加深了大戰略與戰爭行為的關聯。保羅·甘迺迪 (Paul Kennedy) 於其著作中則闡述無論何時國家皆需要取得目的及手段的平衡。巴里·波森 (Barry Posen) 認為，大戰略是「一條政治—軍事、手段—目的鏈，是一個國家對如何最好地為自己帶來『安全』的理論」。綜合前述學者所述，大戰略融合外交、軍事等各方面手段，提供國家決策者超然於特定事件的評斷依據。然而，因政治體制及資源運用之限制，多數大戰略研究著重在大國，尤其是美國研究上。本書作者透過南韓之例子，作證中等強國亦可擁有並實踐本國意志的全方面戰略。愛德華·喬丹 (Eduard Jordaan) 則認為，中等強國在特定領域能展現非凡影響，並會隨議題及時代變動。

作者於書中闡明中等強國外交行為中，由於其較於強權並無能力創造

新秩序且發展受惠於國際現行制度的穩定性，多數國家政策制定具崇尚多邊外交、在爭端中傾向妥協及尋求國際合作等特徵。串連外交象徵中等強國們透過結盟增加其於國際事務的聲量，利基外交說明中等強國致力於單一或特定領域推動國際標準，凸顯其加入國際秩序的意願，並避免中小型國家被動陷入強國制定的全球戰略下，保留其推行政策的獨立及彈性。

二、歷史背景：1948 至 1987 年

南韓的戰略選擇，應立基於兩大前提下，即「兩韓關係」和「美韓同盟」。回顧南韓發展歷史，由於建國於冷戰初期，不可避免的受到意識形態及地緣政治的雙重威脅，民族主義的影響也不外乎影響歷代韓國總統的政策。本書評擬以 1988 年民主化運動作為政策偏向區分。於此之前的諸位總統因應國家統一需要及被視作美國冷戰策略的前線，採取高壓的軍事獨裁政體。

整體安全保障仰賴美國的情形下，各總統的立場略有差異，李承晚總統作為先行者，處於戰後熱衝突好發之時期，為維持國家力量和避免受到共產勢力的侵擾，和美國簽訂了共同防禦條約，同時避免在外交上受到孤立，積極的對外發展外交關係。六零年代起掌權的朴正熙政權透過出口導向型經濟政策，提升了南韓的工業化水準，同時也為國家發展軍武製造自主能力奠定了基礎。國際上，除重申美韓同盟的穩定，亦出兵參與美國對外軍事行動以確保兩國利益具一定關聯，避免美國因自身利益退出同盟。七零年代隨著美國尼克森總統對中關係的升級，南韓尋求兩韓關係可以憑藉國際局勢而升溫，乃至與和平解決分裂問題。雖然結果上來看兩韓關係於當時因雙方經濟差異擴大而無法合意統一，惟韓國於此階段逐漸不堅持於否認平壤當局的國際代表性，同時北韓針對雙方和解的冷淡回應，使南韓事實上加深了與美國關係。全斗煥上任初期，南韓國內局勢動盪加上美國對其處理民怨方式的不滿導致美韓關係略有波動。對北關係上則來到低點，仰光事件、金浦機場事件等炸彈攻擊被視作北方對南韓經濟成長可能

使其於兩韓談判時佔據優勢的回應，此等舉措亦使雙方關係稍好轉時所開放探親等舉看似成效不大。全執政末期對日、蘇及中關係的提升，除了是對共產世界市場的探尋。首爾舉辦 1988 年奧運的成功，亦被其國民視作其已擺脫建國時的窘迫，逐漸在國際舞台上具有一定話語權。

三、南韓的大戰略：三角核心

民主化之後，南韓外交戰略也趨向多元化。盧泰愚政府推行「北方政策」，對北韓採取靈活的外交手段。金大中政府則主打「陽光政策」，試圖以經濟合作促進兩韓關係，亦促成兩韓領導人直接會面。然而，隨著北韓發展核武問題，保守派如李明博、朴槿惠等對北政策趨向強硬，自由派如文在寅政府則欲重修對話管道。同時南韓的對美依賴雖有所調整，但佔據其國家戰略的重中之重。近年來美中的直接競爭，南韓需要在「美韓同盟」及「避免抗中」找尋平衡點，使其外交戰略日漸趨向「戰略模糊」。

民主化同時也帶來穩定的政治體制，定期且不可再選的總統任期使得國家領導人不得隨意依照本人意志推行政策，同時亦迫使國家需要誕生一套超脫任期的決策機制以應對國際局勢的變化。

首先，盧泰愚首創性推出「北方政策」，正視半島關係好轉需考量美中利益的影響，同時藉由經濟和人文交流等非衝突性的合作，正常化北韓對外關係。透過「朝鮮民族統一方案」及「南北和解、互不侵犯、交流及合作協定」之精神，奠定兩韓統一的基礎應自外交及經濟方面著手。美國撤回派駐外國核武的決定，迫使南韓領導人意識需發展自身軍力，對美關係上也一改以往立場，宣傳韓美夥伴關係，表態雙方關係上日漸平等。對中建交的決定，除對中國改革開放市場的追求外，亦欲憑藉中國對北韓影響力來處理兩韓關係。金泳三時期，北韓核開發及美國對北韓立場的強硬導致南韓認知美國利益可能對其造成傷害，於此開始直接與北接觸試圖促成領導人會面，然而成效不彰。對美關係自和平時期軍隊指揮權轉移、積

極參與烏拉圭回合貿易及 UNFCCC 的談判，象徵韓國願意響應美國所主導的倡議，試圖透過國際合作將其影響力跨出朝鮮半島。對中關係上則因中國本身處於臺海危機中而認知到兩韓可能成為其軍事擴張中的犧牲品，於此之後，韓美同盟的嚇阻對象初生中國的角色。

金大中的出現，是首位民主派總統登上高位。其主張陽光政策，將北韓視為潛在夥伴，試圖以經濟同化對方。事實上得益於政策延續性，南北元首會晤正於他的任期發生。後續的民主派總統包含盧武鉉及文在寅在對北關係一定程度上也是「陽光政策」的延續。然而韓國政局的現狀，很大一部分是李明博任期開始轉變。其作為保守派總統，執政初期雖對前二任總統政策有所怨言，對北關係仍受益前任盧武鉉而相對平穩。然而，包含北韓試爆核彈及天安艦事件的發生，將朝鮮半島局勢上升到臨界點，嚇阻政策被重新提上檯面。美國因金、盧兩位自由派前總統友北立場，認為韓美關係已被削落，因此兩韓摩擦提供美國機會介入。對中關係上南韓原欲憑藉六方會談管道確保中國在半島利益得以被滿足，惟該管道式微使傳統外交手段在處理鄰國關係中略顯劣勢。韓國雖欲提升對中經濟交流來促使中國重視雙邊關係，但中國因自身利益無法允諾韓中雙邊利益永續。南韓故此以提升韓美同盟能力，包含遠程攻擊及戰略預警能力以維護自身安全，此舉也延續到繼任總統朴槿惠任內薩德系統部署問題。然而隨著美中關係惡化，兩韓關係的兩位話事人無法產生共同利益，連帶南北韓和解之路停滯不前，隨著雙方國內民眾民族認同感及統一民意基礎逐漸降低的過程，兩韓統一看似機會渺茫。

四、結論

綜合前述，韓國歷代政權的政策制定確實符合存在某種共同目標以致決策者原則上透過平衡南韓、北韓、美國及中國各方利益以推進統一立場。此書對歷史政策的剖析讓讀者得以了解南韓國際戰略的制定背景，並強調南韓在經濟、外交與安全領域的自主性。然而，書中對南韓戰略自主

的描述或許過於理想化，對其內部挑戰與現實困境的分析也略顯不足。韓美同盟雖確保韓國政權的延續，但也許同盟本身即對自主性的破壞。韓國自詡中等強國，在經濟和文化上確實展現出超越其國家規模的能量。然而對「中等國家」而言，在安全外交方面主張「自主性」對政權所生危害是否為國家可「自主」承受之，仍待後世探究。

責任編輯：張芸瑄